

Transportation between Xizhou and Yizhou in the Tang Dynasty

Meng Xianshi

Xizhou and Yizhou were two adjacent prefectures in the Western Regions of the Tang Dynasty. Together with Tingzhou located in the north of Tianshan Mountain, they formed a mutually supportive strategic network which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governing the Western Regions and the Silk Road. Transportation between Xizhou and Yizhou was a microcosm of the Silk Road, so researching it with unearthed documents such as *Xizhou Tujing* could be helpful for understanding Tang's management of the Silk Road. Transportation was convenient between Xizhou with Tingzhou, so it was with Yizhou. According to this article, Xinkai Dao between Xizhou and Yizhou in the 16th year of Zhenguan era was a route connecting Xizhou and Ganlu town, a garrison for Yiwu Army later. This new route developed the transportation between Xizhou and Yizhou. Various kinds of people traveled along the road from Xizhou to Yizhou, in which the government employees was a very important part. That's why the Tang Dynasty maintained great input on the traffic construction.

杜甫“观兵”诗新解

——唐乾元二年西域援军再次入关史实钩沉

吴玉贵

一、缘起

安史之乱（755—763）爆发后，安史军队下河北，陷长安，两渡黄河，再破洛阳，唐朝中原腹地全面沦为战场，唐玄宗、肃宗先后征调朔方、河西、陇右、安西、北庭诸道兵马入朝勤王，唐前期一百多年苦心经营的北方及西北边疆防御体系全面崩塌。杜甫目睹了安西、北庭军队入关勤王的情景，创作了以“观兵”为主题的两首诗歌，留下了西域兵马内调的珍贵的现场记录。

其一为《观安西兵过赴关中待命二首》（以下称《观安西兵》）^①：

四镇富精锐，摧锋皆绝伦。还闻献士卒，足以静风尘。
老马夜知道，苍鹰饥著人。临危经久战，用急始如神。
奇兵不在众，万马救中原。谈笑无河北，心肝奉至尊。
孤云随杀气，飞鸟避辕门。竟日留欢乐，城池未觉喧。

萧涤非先生主编的《杜甫全集校注》，总括历代学者的意见，对这首诗的写作背景做了详细解释。解题称：

黄鹤曰：“此诗当是乾元元年华州作。”《通鉴》唐肃宗乾元元年：“三月，镇西、北庭行营节度使李嗣业屯河内。”“六月，以开府仪同三司李嗣业为怀州刺史，充镇西、北庭行营节度使。”“九月庚寅，命朔方郭子仪、淮西鲁灵、兴平李奂、滑濮许叔冀、镇西·北庭李嗣业、郑蔡季广琛、河南崔光远七节度及平卢兵马使董秦将步骑二十万讨安庆绪。”浦注：“自怀州赴关中待命，道经华州，乃八月以前未赴讨时事也。”不曰镇西，而曰安西，循旧名也。

按，杜甫任华州司功参军在肃宗乾元元年（758）六月至二年七月^②。解题所称“讨安庆绪”，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相州（治今河北临漳县）战役。唐军收复两京后，安西、

^① 萧涤非主编《杜甫全集校注》卷五，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1156—1160页。

^② 参见《杜甫全集校注》“附录”——“杜甫年谱简编”，6535—6539页。

北庭行营节度使李嗣业在乾元元年三月率军进驻怀州河内郡(治今河南沁阳市)^③,六月,兼任怀州刺史,继而率领安西、北庭行营将士参加了乾元元年九月正式开始的相州会战。如果杜甫在华州(治今陕西华县)目睹过李嗣业所率的西域军队,只能是在乾元元年六月至九月之间,即杜甫就任华州至相州战役开始这段时间。

相州战役是唐朝精心策划的一次规模恢弘的大会战。朝廷希望毕其功于一役,通过这次战役一举肃清安史叛军。早在乾元元年五月,战役就已经进入了实际筹划阶段^④。驻扎在怀州的安西、北庭行营,处在与安史军队接战的第一线。战役开始前,李嗣业为了不误戎机,甚至将辎重军需都留在了怀州,率军轻装赴战^⑤。如果按照上文解题中传统观点对《观安西兵》诗的解释,则大战在即,李嗣业首先率军从东方前线向西开拔,远赴千里之外的关中“待命”,然后再原道折返,东向参加相州会战。无论时间是否允许,这都是完全违背常识、不合情理的事。

浦起龙大概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因而特别强调《观安西兵》反映的是“八月以前未赴讨时事”,即将《观安西兵》诗与安西、北庭行营在本年九月参加相州战役区别开来。可是由所谓“九节度”率军参加的相州会战,是当时唐朝举国上下的头等大事,西域勤王兵马不仅参加了会战,而且是这次战役的中坚力量。诗中明确称“奇兵不在众,万马救中原”,又称“谈笑无河北,心肝奉至尊”,“救中原”,“无河北”云云,明显是指打击安史军队。如果《观安西兵》果真是杜甫在华州期间所作,则只能是反映安西军队参加相州会战“赴讨”之事,而不可能指其他军事行动。浦说显然也未得要领。

其二为《观兵》(以下称《观北庭兵》)^⑥:

北庭送壮士,貔虎数尤多。精锐旧无敌,边隅今若何?
妖氛拥白马,元帅待雕戈。莫守邺城下,斩鲸辽海波。

《观北庭兵》下解题称:

黄鹤曰:“诗云:‘北庭送壮士’,按北庭即镇西、北庭节度之兵,元帅谓李嗣业。乾元元年九月,嗣业会九节度攻邺,是时,公有《观安西兵赴关中待命》诗,今诗云‘莫守邺城下,斩鲸辽海波’,乃邺师未溃之前作。公意欲且平吐蕃也。当是乾元二年春作,非秦州诗。”按“意欲且平吐蕃”之说,甚违诗意,盖黄鹤所用千家本列此诗于秦州诗中,受其他忧吐蕃诗之影响而生误会。其他论断,均较稳当。

《观北庭兵》解题主要也引用了黄鹤的观点,认为除了“意欲且平吐蕃”这种说法不妥外,黄鹤“其他论断,均较稳当”。但传统观点对这首诗写作背景的解释同样也存在无法解释的疑点。首先,黄鹤将《观北庭兵》的写作时间限定在“乾元二年春”“邺师

③ “安西、北庭行营”在唐代史料中称谓不同,或作“镇西、北庭”,或作“四镇、北镇”,具体讨论见下文第五节“两个安西北庭行营”。本文中除直接引用史料外,统一称“安西、北庭”。

④ 《旧唐书》卷一〇《肃宗纪》载,乾元元年五月,“以荆州长史季广琛赴河南行营会计讨贼于河北”。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252页。则此时已经开始筹划调集部队。

⑤ 以上李嗣业率军参加相州战役的具体情况,请参见下文第二节“相州战役前后安西北庭行营的活动”。

⑥ 《杜甫全集校注》卷五,1243—1245页。

未溃”之前,即相州战役期间。但乾元元年九月二十一日庚寅,安西、北庭行营在李嗣业统领下与诸节度会攻邺城,二年正月二十七日丙申李嗣业战死于邺城^⑦,其间一直与行营战士在相州战场鏖战,而此时杜甫身在千里外的华州,根本没有在华州观送北庭壮士的可能。同年三月六日壬申唐军在邺城败散,“诸节度各溃归本镇”^⑧,安西、北庭行营将士也护送李嗣业灵柩回到了怀州,唐朝廷在同月二十五日辛卯任命荔非元礼为安西、北庭行营节度使兼怀州刺史,正式接替李嗣业^⑨。也就是说,不仅“邺师未溃”前不存在华州“观兵”的可能,即使是在相州溃败后,安西、北庭行营仍然没有回到关中,杜甫也无由在华州见到安西、北庭行营的军队,不可能在华州“观兵”。

总之,如果按照传统观点,将“观兵”诗的创作时间置于乾元元年至二年杜甫任华州参军期间,与历史背景多有违碍,无法自圆其说。杜甫“观兵”诗,直接反映了安西、北庭将士东调勤王的史实,有必要重新梳理安西、北庭行营入关及之后的线索,进而对“观兵”诗做出新的更合理的解释。

二、第一批内调勤王的西域军队

唐朝驻守西域军队的东调,是从唐肃宗北上灵武之后开始的。此前,在安史之乱初期,驻守在朔方、陇右、河西的唐军主力已经悉数东调,参加了潼关保卫战^⑩。肃宗北上时,玄宗曾特别叮嘱称“西北诸胡,吾抚之素厚,汝必得其用”^⑪。至德元载(756)七月,肃宗在灵武即位后,立即开始筹划征调安西、北庭节度使属下的军队东进勤王。《通鉴》肃宗至德元载七月下载:

上命河西节度副使李嗣业将兵五千赴行在,嗣业与节度使梁宰谋,且缓师以观变。绥德府折冲段秀实让嗣业曰:“岂有君父告急而臣子晏然不赴者乎!特进常自谓大丈夫,今日视之,乃儿女子耳!”嗣业大惭,即白宰如数发兵,以秀实自副,将之诣行在。上又征兵于安西;行军司马李栖筠发精兵七千人,励以忠义而遣之^⑫。

《旧唐书》和《新唐书》“本纪”未载此事。《通鉴》本条前承七月二十七日己卯京兆尹崔光远自长安北抵灵武事,下接同月二十八日庚辰玄宗至成都事,可知征兵命令的

⑦ 《旧唐书》卷一〇《肃宗纪》,253—254页。

⑧ 《资治通鉴》(以下简称“《通鉴》”)卷二二—乾元二年三月,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7069—7070页。

⑨ 《旧唐书》卷一〇《肃宗纪》,255页;《旧唐书》卷一八《段秀实传》,3584页。

⑩ 在天宝十四载十二月颁发的亲征诏书中,玄宗曾下令:“其河西、陇右、朔方,除先发蕃汉将士及守军郡城堡之外,自余马步军将兵健等,一切并赴行营,各委节度使统领,仍限今月二十日齐到。”《亲征安禄山诏》,《唐大诏令集》卷一九,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626页。所谓“一切并赴行营”,就是除了必要的留守外,全部征调到了潼关。玄宗本人也曾对哥舒翰说:“河陇精锐,悉在潼关。”《新唐书》卷一四七《王思礼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4749—4750页;可与亲征诏书互相发明。

⑪ 《通鉴》卷二一八玄宗天宝十四载六月,6976页。“西北诸胡”,《旧唐书》卷一〇《肃宗纪》作“西戎北狄”,240页。

⑫ 《通鉴》卷二一八,6987页。

发布应在七月己卯,上距本月甲子(十二日)肃宗正式即位只有半个月的时间。《通鉴》称李嗣业为“河西节度副使”,《旧唐书·段秀实传》载:“肃宗即位于灵武,征安西兵节度使梁宰,宰潜怀异图。秀实谓嗣业曰:‘岂有天子告急,臣下晏然,信浮妄之说,岂明公之意耶?’嗣业遂见宰,请发兵,从之。乃出步骑五千,令嗣业统赴朔方,以秀实为援,累有战功。”^⑬则李嗣业应是安西节度副使。其他如《旧唐书·李嗣业传》、《新唐书·段秀实传》、《册府元龟》(以下简称《册府》)等也都记载李嗣业自“安西”统兵五千赴难^⑭,《通鉴》“河西”应是“安西”之误^⑮。

李栖筠,或作李棲筠,是唐朝名相李吉甫的父亲,吉甫子德裕的祖父。《旧唐书·李吉甫传》说,李栖筠“国史有传”^⑯;《旧唐书·李德裕传》也称,德裕“祖父自有传”^⑰,但在今本《旧唐书》中却没有李栖筠的传记。可知,在唐修国史中有李栖筠的传记,所谓“祖、父自有传”或“国史有传”,应该是《旧唐书》钞自国史的旧文。也就是说,在唐修国史中,李栖筠祖孙三人都有传记,因而在《李德裕传》和《李吉甫传》中都提示李栖筠自有传;修撰《旧唐书》时删去了李栖筠的传记,但在钞录国史中李德裕和李吉甫的传记时,却不慎保留了李栖筠有传记的旧文。

《旧唐书》的失误,为推测李栖筠入朝勤王记载的史料来源提供了重要的线索。除了上文《通鉴》外,《新唐书》和《册府》也记录了李栖筠率军勤王的事。《新唐书·李栖筠传》称:“(封)常清被召,表摄监察御史,为行军司马。肃宗驻灵武,发安西兵,栖筠料精卒七千赴难,擢殿中侍御史。”^⑱《册府》亦载:“李栖筠为封常清安西行军司马。玄宗幸蜀,肃宗兴复于灵武,征兵于安西,栖筠以精卒七千人赴行在所。栖筠感以臣子大义,士皆有忘家死难之志。克复两京,迁殿中侍御史。”^⑲比较诸书李栖筠率军勤王的内容,《新唐书》无《通鉴》“励以忠义而遣之”的记载,而《通鉴》则略去了《新唐书》“擢殿中侍御史”的内容;唯独《册府》的记载最为全面。根据《旧唐书》保留的李栖筠国史有传的记载,完全有理由推定,以上三书各自源自唐修国史,而《册府》因为是照录原文,所以保留的内容最完整。虽然相关细节尚不清楚,

^⑬ 《旧唐书》卷一二八《段秀实传》,3284页。

^⑭ 《旧唐书》卷一〇九《李嗣业传》,3299页;《新唐书》卷一五三《段秀实》,4848页;《册府元龟》(以下简称“《册府》”)卷三七三《将帅部·忠》,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4443页;《册府》卷三九六《将帅部·勇敢》,4700页;《册府》卷七五九《总录部·忠》,9029页。

^⑮ 刘子凡《瀚海天山——唐代伊西庭三州军政体制研究》已指出《通鉴》此处的讹误,并认为《通鉴》安西兵力分别由李嗣业、李栖筠率领,分两批勤王的记述不可靠。“当时节度使梁宰尚在安西,不应由行军司马李栖筠来发兵。且肃宗征兵五千,安西尚踟蹰不肯发兵,若真的再次征兵,岂会痛快地再发兵七千?《资治通鉴》的理解显然有误。”上海:中西书局,2016年,315—316页。此说否定了《通鉴》李栖筠在李嗣业之后率军入关的记载。今按,根据下文讨论可知,《通鉴》有关李栖筠率七千兵士入朝增难的记载,源自唐修国史,并为后出诸史转录,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而李嗣业率军五千入关的记载,除了上文《旧唐书》卷一二八《段秀实传》(3284页)外,还见于《新唐书》卷一五三《段秀实传》(4848页)、《册府》卷七五九《总录部·忠》(8531页)。从“事理”立论,尚不足以否定《通鉴》的记载。

^⑯ 《旧唐书》卷一四八《李吉甫传》,3992页。

^⑰ 《旧唐书》卷一七四《李德裕传》,4509页。

^⑱ 《新唐书》卷一四六《李栖筠传》,4735页。

^⑲ 《册府》卷三七三《将帅部·忠》,4443页。

但大体可以肯定,至德元载七月后,安西节度使先后派出两批援军,一批五千人由节度副使李嗣业统率,一批七千人由行军司马李栖筠统率,兼程赶赴肃宗行营^⑳。

约略与此同时,北庭节度使下的三千精兵也由将领马璘统帅东进入关。常袞所撰《马璘碑》载:

初,公自二庭,统甲士三千,赴凤翔行在。遂陈灭胡之策,先皇帝奇之,

曰:“吾无忧于东方也。”^㉑

同样出自常袞手笔的《马璘墓志》亦载:

公讳璘,字仁杰。(中略)年廿二,仗剑西游,横绝大漠。抵二庭之极塞,收万里之奇功。下上戎班,伯仲勋将。天宝逾纪,狂凶叛燕,岐阳兴复夏之师,天下会尊周之戍(戎)。公受命戎师,誓勤王家,与西州士大夫暨诸蕃君长涉乌戈,经赤庭,由陇及岐,视险如砥。躬擐甲冑,手捧兵符,献于行宫,凡数万。以二先皇穆然垂意,特以良将器之^㉒。

碑、志俱称马璘自“二庭”赴肃宗行营勤王,其他如《旧唐书·马璘传》《新唐书·马璘传》《册府》也都如此表述^㉓。肃宗宝应元年(762),唐朝将西州首县高昌和北庭首县金满,分别易名作前庭县和后庭县^㉔,自此“二庭”便成了伊西庭节度(即北庭节度)的代称^㉕。如代宗大历三年(768),朝廷计划将安西、北庭行营调往泾州,引发了一场兵变阴谋。在《册府》的记载中,保留了“四镇、二庭”的旧称,而《旧唐书》《新唐书》《通鉴》在记载同一事件时,则将原来的“二庭”,改成了习见的“北庭”^㉖。又,撰写于建中三年(782)的《高耀墓志》,称赞伊西庭支度营田副使高耀勋绩卓著,“弘益二庭”等^㉗,都是显例。另据《马钺碑》载,钺父璘,“仗剑万里,建绩二(府)〔庭〕”,长子钺生于“伊西”^㉘。也可证明马璘确实是从“二庭”即伊西

^⑳ 《旧唐书》卷一二八《段秀实传》,3284页;《新唐书》卷一四六《李栖筠传》,条4735页;《通鉴》卷二一八玄宗肃宗至德元载七月,6987页。

^㉑ 原题《故四镇北庭行营节度使扶风郡王赠司徒马公神道碑铭》,《唐文粹》卷五七,宋绍兴九年(1139)临安府刻本,叶一七背。

^㉒ 原题《大唐故四镇北庭行营节度兼泾原颍郑等节度观察使尚书左仆射扶风郡王赠司徒马府君墓志铭并序》,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六辑,西安:三秦出版社,1999年,98—99页。“尊周之戍”,王育龙《唐马璘墓志铭述考》(《文博》1997年第6期,93—96页)“戍”作“戎”,是。王育龙文断句多误,此从《全唐文补遗》录文。又,马璘葬于代宗大历十二年,“二先皇”应指玄宗与肃宗。

^㉓ 《旧唐书》卷一五二《马璘传》,4065页;《新唐书》卷一三八《马璘传》,4617—4618页;《册府》卷三五八《将帅部·立功》,4252页;《册府》卷三七三《将帅部·忠》,4443页。

^㉔ 《新唐书》卷四〇《地理志》,1046页。

^㉕ 陈国灿《安史乱后的唐二庭四镇》,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二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415—416页。

^㉖ 《册府》卷三六七《将帅部·机略》,4363页;《旧唐书》卷一二八《段秀实传》,3585页;《新唐书》卷一五三《段秀实传》,4850页;《通鉴》卷二二四代宗大历三年,7205页。《册府》本段记载与《旧唐书》基本相同。但“筹既差互”,《旧唐书》夺“筹”字,“二庭”,《旧唐书》作“北庭”,据此判断,二书同源,《册府》保留了更多的原始信息。

^㉗ 《高耀墓志》,侯灿、吴美琳《吐鲁番出土砖志集注》,成都:巴蜀书社,2003年,642—646页。

^㉘ 熊执易《武陵郡王马公神道碑》,《文苑英华》卷八九二,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4694—4696页。“二府”,《全唐文》卷六二三作“二庭”,6289—6291页,据改。

庭地区率军勤王的。

《马璘墓志》称“公受命戎师，誓勤王家，与西州士大夫暨诸蕃君长涉乌弋，经赤庭，由陇及岐，视险如砥。躬擐甲冑，手捧兵符，献于行宫，凡数万”。这段文字需要略作解释。首先，上引诸书俱载马璘统众三千入关，《马璘墓志》之“数万”，显然是将“诸蕃君长”即西域胡国勤王兵马与北庭援军计算在了一起。由此可以推知，第一批东进勤王的西域土著国军队，很可能是随马璘所率北庭援军一起入关的。从传统文献中确切可知参加收复两京军事行动的有于阗、拔汗那、大食等西域胡国的军队，其中仅于阗王尉迟胜率领的军队就有五千人^{②③}；而肃宗在征发拔汗那兵的同时，还特别下令拔汗那“转谕城郭诸国，许以厚赏，使从安西兵入援”^④。从这些迹象判断，墓志所称“数万”，与西域实际入关兵力的差距应该不是很大。“乌弋”即西域古国乌弋山离（约当今阿富汗西部之赫拉特）的简称，“赤庭”可能是指唐赤亭守捉所在地赤亭口（在今新疆鄯善县境内），从上文解释可知，“涉乌弋，经赤庭”云云，应该是对西域诸国援兵东来勤王的一般性描述，而不是对实际行经路线的记录。其次，马璘所率为伊西庭节度使下的军队，因而墓志特别强调“西州士大夫”。又，岐县为凤翔府属县，“由陇及岐”，是“赴凤翔”的另一种不同的表述方式。

综上所述，至德元年东调的西域唐军约为一万五千人，其中安西节度使派出两批一万二千人，占常设兵力总数的一半；北庭节度使三千人，占兵力总数七分之一强^⑤。参加勤王的西域诸国兵力应该也在万人以上。

三、相州战役前后安西北庭行营的活动

安西、北庭勤王兵马入关初期，名义上由关内行营节度使王思礼统领。王思礼其人原为营州城傍高丽人，长期在河陇服役，曾担任关西兵马使、河源军使、金城郡太守等职，安史之乱后，任哥舒翰元帅府马军都督，随翰守卫潼关^⑥。潼关陷落后，王思礼率溃军西归。至德元载六月，在京兆金城县（今陕西兴平市）与刚刚逃出长安的玄宗相遇，玄宗“以思礼为河西、陇右节度使，即令赴镇，收合散卒，以俟东讨”^⑦。当王思

^{②③} 《通鉴》卷二一九肃宗至德元载十二月，7010页；同卷至德二载正月，7014页；《唐会要》卷一〇〇《大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2127页；《册府》卷九七三《外臣部·助国讨伐》，11434页。刘子凡根据天宝年间于阗国总户数“四千四百八十七”的记载，对尉迟胜率兵“五千”的提出质疑，认为“所谓‘五千’，大概是指安西四镇入援的总兵力，尉迟胜的于阗兵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只不过史书在书写过程中讹为尉迟胜自率兵五千了”。这种质疑固然不无道理。但在没有确切史料证据的情况下，不宜轻易否定明显出于不同来源的相关记载，所谓“五千”，或者容有夸张，或者是包括了于阗之外的其他西域国的兵力，将它理解为“安西四镇入援的总兵力”，似乎不妥。

^④ 《通鉴》卷二一九肃宗至德元载九月，6998页。

^⑤ 开元二十一年定额，安西节度使兵力二万四千人，北庭节度使二万人。见《通典》卷一七二《州郡序目》，4479页。

^⑥ 《旧唐书》卷一一〇《王思礼传》，3312页；《新唐书》卷一四七《王思礼传》，4750页。

^⑦ 《通鉴》卷二一八肃宗至德元载六月，6973页。

礼到达平凉（治今宁夏固原县）时，得到河西胡人部落离乱的消息，于是转而前往庆州（治今甘肃庆阳）谒见肃宗，被肃宗任命为行在都知兵马使^⑧。同年十月，肃宗任命房琯为招讨西京使，王思礼为副使，率军东征。未几兵败，又在同年十二月任命王思礼为关内行营节度使，驻守武功^⑨。

“关内节度使”或称“关内行营节度使”，只存在了五年时间（756—761），是在肃宗即位后，征调西北边兵至关中集结，准备攻取东、西二京的背景下，为协调、督察各路勤王兵马而临时设置的官职^⑩。在肃宗至德二载正月进攻西京前发布的诏书中称：“使郭子仪领朔方精骑三万，步卒五千，并回纥兵二万人；使王思礼领安西、北庭、河陇马步五万。”^⑪同年十二月收复两京后发布的大赦诏中，王思礼的具衔是“开府仪同三司、御史大夫兼工部尚书、持节充招讨西京、并定武、威武、兴平等军兼关内节度、河西·陇右·伊西·四镇行营兵马使”，李嗣业的具衔为“开府仪同三司兼右金吾卫大将军同正员、仍充四镇·伊西北庭行军兵马使”^⑫。安西、北庭行营兵马名义上由关内节度使王思礼统辖，但实际上仍然归安西、北庭行营节度使（或移兵马使）李嗣业指挥。

在至德二载收复西京的香积寺之战中，李嗣业率安西、北庭及西域兵马为前军，朔方、河西、陇右行营节度使郭子仪为中军，关内行营节度使王思礼为后军。两军对垒泮水，安史军兵力十万，唐军十五万，安西、北庭军队表现出了强大的战斗力。据《册府》记载：

贼将安守忠、李归仁悉以前军来逼，我师殆乱，前军节度使李嗣业谓子仪曰：“今日之事，若不以身啖寇讎，决战取胜，三军之士无子遗矣。”言讫，乃仗长刀立阵前，解衣袒而大呼，手杀数十人，阵容方整。由是前军之士皆执长刀，如墙而进，所向摧靡。先是，贼伏一军于营东，候动则发。侦者知之，以告。帝亲率回纥锐卒剪其伏军，遂蹶大营背，与嗣业合势，表里夹攻。自辰及酉，斩首六万余级，贼军大溃，填沟涧而死者十七八^⑬。

^⑧ 《通鉴》卷二一八肃宗至德元载六月，6979页。据《旧唐书》卷一一〇《王思礼传》（3312页）、《旧唐书》卷一一一《房琯传》（4750页）、《册府》卷四三二《将帅部·立后效》（5146页）和于邵《为人请合祔表》（《文苑英华》卷六〇八，3151页）记载：至德元载九月，王思礼与潼关败将李承光、吕崇贇等同至顺化郡（庆州）谒见肃宗，肃宗以不能坚守，欲将众将斩首，经房琯救谏，始释王、吕，独斩李承光。《通鉴》未载李承光、吕崇贇事，将王思礼谒见肃宗事置于本年六月肃宗停留平凉期间，误。《通鉴》称“以思礼为行在都知兵马使”。按，本年六月，肃宗的身份还是皇太子，不可能称“行在”，《通鉴》无意中保留下来的“行在”的表述，同样表明王思礼来到顺化郡的时间，只能是在七月肃宗称帝之后，而不是登上皇位前的六月。

^⑨ 《旧唐书》卷一〇《肃宗纪》，244页；《新唐书》卷一四七《王思礼传》，4750页。

^⑩ 《新唐书》卷六四《方镇表》“朔方”，1766—1767页。

^⑪ 《谕西京逆官敕》，《唐大诏令集》卷一一八，617—618页。

^⑫ 参见《册府》卷八七《帝王部·赦宥》，1031—1035页。

^⑬ 《册府》卷二〇《帝王部·功业》，215页。

《册府》本段史料的内容比其他相关记载更详尽^{④①}。“帝”指代宗。此时代宗为广平王,担任唐军元帅。《册府》内容详于诸书,且称代宗为“帝”,表明《册府》的记载应该出自《代宗实录》。从这段记载可知,安西、北庭行营军队与回纥精骑,在收复长安的战斗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本年十月,在收复洛阳的关键一役新店战役中,“嗣业与子仪遇贼于新店,与之力战,数合,我师初胜而后败,嗣业逐急应接。回纥从南山望见官军败,曳白旗而下,径抵贼背,穿贼阵,贼阵西北角先陷。嗣业又率精骑前击,表里齐进,贼众大败,走河北。子仪遂收东都”^{④②}。与香积寺战役一样,新店战役的首功也归于安西、北庭行营与入唐回纥骑兵。

唐军收复两京之后,安庆绪退居相州,肃宗令安西、北庭行营节度使李嗣业等略定河南、河东州县^{④③},河北郡县纷纷倒戈降唐,留守范阳的史思明见大势已去,也公开与安庆绪决裂,以所部河北十三郡投降朝廷,“虽相州未下,河北率为唐有矣”^{④④}。随着朝廷势力的向东推进,安西、北庭行营开进了唐朝廷与安史乱军交界的前沿,在乾元元年三月进驻新收复的怀州。同年四月,安庆绪趁安西、北庭行营立足未稳,组织二万军队反攻怀州,被李嗣业击退。六月,朝廷特别以节度使李嗣业兼任怀州刺史,以便利征调军需物资,怀州成为安西、北庭军队相对固定的驻地^{④⑤}。同年七月,杜甫代替华州刺史郭某撰写了一篇状文,分析当时敌我军事态势,建议朝廷针对形势的变化,采取不同的应对策略,其中一条是,“贼之精锐,撮在相、魏、卫之州,贼用仰魏而给。贼若抽其锐卒,渡河救魏、博,臣则请朔方、伊西北庭等军,渡沁水,收相、卫”^{④⑥}。安西、北庭行营驻扎怀州,进可北收相、魏,压迫安庆绪在河北的心腹之地;退能南守河防,有效守卫东都洛阳,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意义,安西、北庭行营在与安史战争中的重要地位也于此可见。

乾元元年九月相州战役正式开始后,李嗣业为了不贻误战机,将辎重留在怀州,奏请判官段秀实担任怀州长史知州事兼节度留后,负责后勤保障^{④⑦};自己率军轻骑简装,先后参加了收复卫州(治今河南浚县)和围攻相州的战斗。与收复两京战役一样,安西、北庭军队勇猛善战,“诸将无功,独嗣业被坚数奋,为诸军冠”^{④⑧},战斗力强大,

④① 主要参见《通鉴》卷二二〇肃宗至德二载九月,7033—7034页;《旧唐书》卷一〇九《李嗣业传》,3299页;《新唐书》卷一三八《李嗣业传》,4616—4617页;《旧唐书》卷一二〇《郭子仪传》,3451页;《新唐书》卷一四七《王思礼传》,4750页。《旧唐书》卷一二一《仆固怀恩传》,3478页;《新唐书》卷二二四上《叛臣传》上《仆固怀恩传》,6366页。

④② 《旧唐书》卷一〇九《李嗣业传》,3310页。

④③ 《通鉴》卷二二〇肃宗至德二载十一月,7044页;《新唐书》卷一三八《李嗣业传》,4617页。

④④ 《通鉴》卷二二〇肃宗至德二载十二月,7047—7048页。参见《旧唐书》卷二〇九《史思明传》,5378—5379页。

④⑤ 《通鉴》卷二二〇肃宗乾元元年三月,7052页;同年四月,7053页;同年六月,7057页。

④⑥ 杜甫《为华州郭使君进灭残寇形势图状》,《杜甫全集校注》卷二二,6407—6415页。“伊西北庭”,点校本作“伊西、北庭”。“郭使君”不详。状文末称“乾元元年七月日某官臣状进”。

④⑦ 《旧唐书》卷一二八《段秀实传》,3584页;《新唐书》卷一五三《段秀实传》,4848页。

④⑧ 《旧唐书》卷一〇九《李嗣业传》,3310页。

迥出诸军之上。

乾元二年正月丙申,李嗣业在相州城下中箭身亡,安西、北庭行营节度使由兵马使荔非元礼继任。三月,相州战役失利,六十万唐军作鸟兽散,退守洛阳,安西、北庭行营也在荔非元礼的率领下回到怀州驻地^{④⑨},唐军攻势全面瓦解。此后,史思明杀害安庆绪,自称大燕皇帝,而唐朝也以李光弼替代郭子仪担任唐军主帅。乾元二年九月,史思明分兵四路,再次南渡黄河,自汴州(今河南开封)西进,李光弼放弃洛阳,移军坚守河阳(今河南孟县),九月二十七日庚寅,史思明入洛阳^{⑤①},双方开始了新一轮较量。

四、洛阳再陷与第二批内调的西域军队

安史军队再次席卷而西,引起朝野巨大震恐,唐朝廷急忙在陕州(治今河南三门峡市)部署兵力,组成拱卫长安的战略防线。与此同时,继至德元载第一批西域唐军内调勤王之后,紧急征调第二批西域留守唐军入关勤王。《通鉴》乾元二年十一月下载:

发安西、北庭兵屯陕,以备史思明^{⑤②}。

《通鉴》本条不系日,下文接七日庚午纪事,其事应在十一月七日或稍前。《新唐书》也在乾元二年下记载称:

乾元二年十月,诏百官上勤政楼观安西兵赴陕州,有狐出于楼上,获之^{⑤③}。

一称“屯陕”,一称“赴陕州”,二书所载当是同一事件,但具体时间一在十月,一在十一月,略有差异。发兵赴陕州之前,肃宗曾在乾元二年十月初四丁酉下诏,计划在十月十七日率军亲征东京,被苏源明等众臣谏止^{⑤④}。苏源明在第三次上书进谏时,列举了肃宗亲征“甚不可”的十条理由,其中第八条认为,军事形势正在朝着有利朝廷的方向好转,肃宗不必动一时之怒,亲履险地。《册府》记载了苏源明上疏的比较详尽的文本,其中第八条称:

司空李光弼能拔河阳,尚书王思礼应下晋原,中丞卫伯玉劲卒接焉耆、过析支,不日且至,大夫王玄志压巫闾、临幽都,汝州刺史田南金乘阙口、逼二室,扬州长史邓景山凌长淮、饯梁汴。然而狂贼失身,蹙于缙氏山,北不敢逾孟津,东不敢过罍子,只待反接耳。陛下不坐而受之,而欲亲征,徇一朝之怒,甚不可八也^{⑤⑤}。

从肃宗下诏亲征及诏书中提到的计划亲征的日期可以推知,苏源明进谏的时间应该是在

④⑨ 《旧唐书》卷一〇《肃宗纪》,255页。

⑤① 《旧唐书》卷一〇《肃宗纪》,255页;《新唐书》卷六《肃宗纪》,162页。

⑤② 《通鉴》卷二二一,7089页。

⑤③ 《新唐书》卷三五《五行志》,923页。

⑤④ 《旧唐书》卷一〇《肃宗纪》,257页;《通鉴》卷二二一肃宗乾元二年,7083页。

⑤⑤ 《册府》卷五五二《词臣部·献替》,6620—6621页。

乾元二年十月四日至十七日期间^{⑤4}。苏源明在上书中说：“臣等今月四日及七日上言，车驾幸东京不便。吁天而诉，稽首而祈，竭诚不精，留中不下。臣等自咎自毒，若僭若狂。”据此可进一步将第三次上书进谏的时间确定在十月七日稍后，即七日至十四日期间。苏源明在上书中提到“卫伯玉劲卒接焉耆、过析支”，卫伯玉率领的“劲卒”，包括了从西域征调的参加守卫陕州的军队（说详下文），可知迄止十月七日稍后，安西部队尚未赶到长安，但已“不日可至”。

综合以上记载判断，《新唐书》“十月”可以理解为安西军队到达长安的时间，而《通鉴》之“十一月”，则是到达陕州的时间。安西军队很可能是在十月中下旬到达长安，举行完勤政楼观兵仪式后，在十一月七日前赶到了陕州。

上文《册府》载苏源明说“中丞卫伯玉劲卒接焉耆、过析支，不日且至”，《新唐书》作“卫伯玉拂焉耆，过析支，不日可至”^{⑤5}。都没有明确提到卫伯玉所率勤王军队的来源。一年以后，肃宗上元元年（760）八月卫伯玉改任神策军节度使，《通鉴》追溯前事称：

初，哥舒翰破吐蕃于临洮西关磨环川，于其地置神策军。及安禄山反，军使成如璆遣其将卫伯玉将千人赴难^{⑤6}。

可知卫伯玉是由洮阳郡太守兼神策军使成如璆派遣的将领^{⑤7}，率军由陇右赴难。但《旧唐书·卫伯玉传》载：

卫伯玉，有膂力，幼习艺。天宝中杖剑之安西，以边功累迁至员外诸卫将军。肃宗即位，兴师靖难，伯玉激愤，思立功名，自安西归长安。初为神策军兵马使，出镇（陕州行营）^{⑤8}。

据此则卫伯玉是自安西入朝，出镇陕州^{⑤9}。将卫伯玉入朝与安西勤王兵马相联系，不仅与《通鉴》及《新唐书》所载肃宗令百官至勤政楼观“安西兵”赴陕州在时间和内容上高度契合，也与陕州保卫战立功后，卫伯玉在乾元二年年底正式受命为安西、北庭行营节度使相一致（参见下文第五节），但这些记载与卫伯玉自陇右领命，率军赴难的记载相矛盾。

上文苏源明所称“中丞卫伯玉劲卒接焉耆、过析支”，为理解两种不同的记载提供

⑤4 《全唐文》四三《亲征史思明诏》（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474—475页）称“即以今月十七日幸东京，率六军取北路进发”。《唐大诏令集》卷七九（455页）只保留了诏令的部分内容，并在注文中误系于“乾元二年九月”。

⑤5 《新唐书》卷二〇二《文苑传》中《苏源明》，4848页。

⑤6 《通鉴》卷二二一，7096页。据上文，卫伯玉入关在乾元二年十月下旬，《通鉴》称：“及安禄山反，军使成如璆遣其将卫伯玉将千人赴难”，不确。

⑤7 《唐会要》卷七八《节度使》，1689页。

⑤8 《旧唐书》卷一一五《卫伯玉传》，3378页。“初为神策军兵马使出镇”文意未足。《册府》卷三五八《将帅部·立功》（第4252页）“出镇”下有“陕州行营”四字。《新唐书》卷一四一《卫伯玉传》（第4657页）亦称，卫伯玉“领神策兵马使，出镇陕州行营”，据补。

⑤9 《新唐书》卷四〇《兵志》，1332页；《新唐书》卷一四一《卫伯玉传》，4657页；《册府》卷三五八《将帅部·立功》，4252页；《册府》卷三八五《将帅部·褒异》，4572页同。

了有益的思路。如所周知，析支是今青海省境内黄河河曲地区的古称^{⑥0}。苏源明将析支与焉耆并称，可以解释为安西军队从西域到达陇右，然后由神策军兵马使卫伯玉率领，与神策军勤王军队一起来到了长安。也就是说，东调守卫陕州的唐军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来自西域的安西、北庭留守军，一是陇右节度使属下的神策军。因为卫伯玉麾下除了神策军外，还有西域援军，所以有些记载称他是“自安西归长安”。

相关记载中，没有提到乾元二年第二次入关勤王的安西、北庭军队的数量。在现存的记载中，多称卫伯玉行营为“安西兵”，鲜有提到神策军的记载^{⑥1}，可知卫伯玉行营，主要是由安西、北庭兵力组成的。据此可以推测，乾元二年入关的西域军队，数量应该是很可观的。杜甫在《观安西兵》诗中称“奇兵不在众，万马救中原”，“万马”当然不能作为实际数字看待，但在诗人看来，“万马”并不算多，所以杜甫的描写可以作为入关数量的参考。据上文讨论，唐西域常设总兵力约四万四千人，至德元年第一次勤王的唐军大概是一万八千人^{⑥2}。如果二次入关以万人计，则乾元二年以后西域留守兵力只剩一万五千左右。

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一点是，史思明攻占洛阳在乾元二年九月二十七日庚寅，而在十月中上旬西域和陇右勤王军队已经到达长安，根据时间推断，内调西域军队应该是在洛阳失陷之前，即九月初史思明南渡黄河之后。

五、两个安西北庭行营

卫伯玉到达陕州后不久，就率军在陕州东的礪子阪与来犯的史思明将领李归仁展开了激战。《通鉴》肃宗乾元二年十二月：

史思明遣其将李归仁将铁骑五千寇陕州，神策兵马使卫伯玉以数百骑击破之于礪子阪，得马六百疋，归仁走。以伯玉为镇西、四镇行营节度使。李忠臣与归仁等战于永宁、莎栅之间，屡破之^{⑥3}。

安史之乱爆发后，以行营为名者有“镇西、北庭（或称‘安西、北庭’‘四镇、北庭’）行营”“关内行营”“朔方、河西、陇右行营”^{⑥4}“淮西、襄阳节度行营”^{⑥5}“河南、淮南、淮西、荆南、山南东五道节度行营”等^{⑥6}，未见有“镇西、四镇行营”的记载，而且“镇西”就是“四镇”的别称（参见下文），“镇西、四镇”文意也不通。《旧唐书·卫伯玉传》载此役称：“逆贼史思明遣伪将李归仁铁骑三千来

⑥0 《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赐支者，《禹贡》所谓析支者也。南接蜀、汉徼外蛮夷，西北〔接〕鄯善、车师诸国。”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2869页。即此。

⑥1 稍后，朝廷甚至将这支部队径直命名为“四镇、北庭行营”。参见本节下文。

⑥2 参见第二节“第一批内调勤王的西域军队”。

⑥3 《通鉴》卷二二一，7089页。

⑥4 《册府》卷一二二《帝王部·征讨》，1459页。

⑥5 《旧唐书》卷一一四《鲁灵传》，3363页。

⑥6 颜真卿《李光弼碑》，《颜鲁公文集》卷四，《四部丛刊》本，13—21页。

犯,伯玉以数百骑于疆子坂击破之,积尸满野,虏马六百匹,归仁与其党东走。以功迁右羽林军大将军,知军事。转四镇、北庭行营节度使^{⑥7}。”《新唐书·卫伯玉传》及《册府》多处记载疆子坂战役,俱作“四镇、北庭行营”^{⑥8},显然《通鉴》“镇西、四镇”,应是“四镇、北庭”之误。可知,到达陕州两月,这支由西域和陇右将士组成的援军就得到了“四镇、北庭行营”的名号,并由卫伯玉担任了行营节度使。

据上文第二节讨论,此前在至德元载第一批入关的安西、北庭和西域诸国的援军,曾被整编为以李嗣业为指挥官的行营,沿用原来的安西、北庭节度名号,称“安西、北庭行营”或“四镇、北庭行营”,至德二载后,安西大都护府一度改为镇西大都护府^{⑥9},所以有时又称“镇西、北庭行营”。相关史籍中,李嗣业的职衔或作“安西、北庭行营节度使”^{⑦0},或作“四镇、北庭行营节度使”^{⑦1},或作“镇西、北庭行营节度使”^{⑦2},或作“四镇、伊西北庭行营兵马使”^{⑦3};有时还可以省称作“北庭行营节度使”或“镇西节度使”等^{⑦4}。具衔的不一,反映了安西、北庭行营名号混杂的情形。李嗣业及此后担任安西、北庭行营节度使的军将如马璘、段秀实、李怀光、朱泚等人的具衔都有“四镇、北庭行营节度使”的称谓^{⑦5},与卫伯玉的署衔相同,如果仅仅从署衔判断的话,则卫伯玉所率之“四镇、北庭行营”,完全可以视为是至德元载入关的“安西、北庭行营”的别称。

这里需要解释清楚的问题是,卫伯玉所率兵马是在肃宗乾元二年十月入关的安西、北庭援军,而第一批西域勤王兵马早在至德元载就已入关并参加了收复两京的战役。卫伯玉麾下的安西、北庭行营,与至德元载入关的安西、北庭行营到底是不是同一个行营?如果是,它们是何时、如何合并的?如果不是,二者之间有什么关系?

卫伯玉乾元二年十二月担任安西、北庭行营节度使,上元元年八月改任“神策军节度使”^{⑦6},任期不满一年。在上文第三节中,我们梳理了至德元载入关的安西、北庭行营在相州战役前后的活动轨迹。乾元二年正月李嗣业阵亡后,安西、北庭行营由荔非元礼代理。相州之役唐军失利,荔非元礼在乾元二年三月回到怀州,正式受命为安西、北庭行营节度使,并与前任节度使李嗣业一样,兼任了怀州刺史^{⑦7}。肃宗上元二年二月邛

⑥7 《旧唐书》卷一一五《卫伯玉传》,3378页。

⑥8 《新唐书》卷一四一《卫伯玉传》,4657页;《册府》卷三八五《将帅部·褒异》,4247页;《册府》卷四一九《将帅部·以少击众》,4997页;《册府》卷四三四《将帅部·献捷》,5159页。

⑥9 《新唐书》卷四〇《地理志》四,1047—1048页;《新唐书》卷六七《方镇表》四,1870页;《通鉴》卷二〇肃宗至德二载,7051页。《地理志》误系于至德元载。

⑦0 《新唐书》卷六《代宗纪》,166页。

⑦1 《册府》卷三五八《将帅部·立功》,4248页。“四镇”,《册府》讹作“西镇”。

⑦2 《册府》卷一二二《帝王部·征讨》,1459页。

⑦3 《新唐书》卷六《肃宗纪》,159页。“伊西北庭”(或称“伊西庭”),是“北庭节度使”的全称。

⑦4 《新唐书》卷一〇《肃宗纪》,253页;《通鉴》卷二二一肃宗乾元二年,7068页。

⑦5 《旧唐书》卷一五二《马璘传》,4066页;熊执易《马鞞碑》,《文苑英华》卷八九二,4694—4696页;《旧唐书》卷一一《代宗纪》,312页;《旧唐书》卷一二一《李怀光传》,3492页;《旧唐书》卷一二《德宗纪》,325页。

⑦6 《通鉴》卷二二一肃宗上元元年八月,7096页。

⑦7 《旧唐书》卷一〇《肃宗纪》,255页;《通鉴》卷二二一乾元二年三月,7072页。

山之役唐军兵败,史思明攻陷怀州^{⑦8}。此后,荔非元礼率军移镇绛州翼城。宝应元年三月,安西、北庭行营兵士因粮赐不足起事,杀害荔非元礼,推举安西胡人白孝德继任行营节度使^{⑦9}。在此期间(759—762),安西、北庭行营节度使的职务一直是由荔非元礼担任^{⑧0}。卫伯玉不可能在同时担任安西、北庭行营节度使(759—760)。换言之,在卫伯玉担任安西、北庭行营节度使期间,实际上存在两个以“安西、北庭”为名的行营。荔非元礼率领的安西、北庭行营,由至德元载第一次进入内地的西域勤王军队组成,主要活动在洛阳以北的怀州、翼城一带;卫伯玉率领的安西、北庭行营,由乾元二年十月第二批入关的西域军队与陇右神策军构成,一直驻守在陕州,承担拱卫长安的战略防御任务。

通过卫伯玉由安西、北庭行营节度使改任神策军节度使的相关记载,可以对两个安西、北庭行营的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探讨。卫伯玉改任之事,以《唐会要》和《新唐书·兵志》的记载最为详尽。《唐会要》称:

及安禄山反,(成)如璆使其将卫伯玉领神策军千余人,赴难于相州城下。官军相州之败,伯玉收其兵,与观军容使鱼朝恩同保陕州。时西边土地已没,遂语(诏)伯玉所领军号神策军,以伯玉为军使,与陕州节度使郭英义同镇于陕,观军容使鱼朝恩亦在焉。敕伯玉以其兵东讨有功,遂加号神策军节度使^{⑧1}。

《新唐书·兵志》载:

上元中,以北衙军使卫伯玉为神策军节度使,镇陕州,中使鱼朝恩为观军容使,监其军。初,哥舒翰破吐蕃临洮西之磨环川,即其地置神策军,以成如璆为军使。及禄山反,如璆以伯玉将兵千人赴难,伯玉与朝恩皆屯于陕。时边土陷蹙,神策故地沦没,即诏伯玉所部兵,号“神策军”,以伯玉为节度使,与陕州节度使郭英义皆镇陕^{⑧2}。

除了阙载卫伯玉在就任神策军节度使之前曾担任安西、北庭行营节度使,以及《唐会要》错误地将相州战役中李嗣业和荔非元礼两位安西、北庭行营节度使的事迹误植在了卫伯玉身上之外,这两种记载都将卫伯玉担任神策军节度使的原因归结为“西边土地已没”或“神策故地沦没”,即神策军在陇右的原驻地陷落,因此下诏以伯玉所率勤王兵马为神策军,并任命卫伯玉为节度使。

⑦8 《旧唐书》卷二〇〇上《史思明传》,5381页;《新唐书》卷二二五上《逆臣传》上《史思明传》,6431页。

⑦9 《旧唐书》卷一二八《段秀实传》,3584页;《新唐书》卷一三六《李光弼传》附《荔非元礼传》,4591页。

⑧0 《新唐书》卷一三六《李光弼传》附《荔非元礼传》,4591页;《旧唐书》卷一二八《段秀实传》,3584页;《新唐书》卷一三五《段秀实传》,4848页;《通鉴》卷二二二肃宗宝应元年建卯月,7120页;《册府》卷九四〇《总录部·患难》,11077页。

⑧1 《唐会要》卷七二《京城诸军》,1533页。“遂语伯玉所领军号神策军”,下文《新唐书》卷五〇《兵志》“语”作“诏”,《唐会要》涉形近误。

⑧2 《新唐书》卷五〇《兵志》,1332页。

按,神策军是天宝十三载哥舒翰在临洮城西八十里设置的军镇^③,所谓“故土沦没”,就是指洮州陷蕃。据《新唐书》记载,吐蕃在肃宗宝应元年攻陷洮州^④,《元和郡县图志》记为广德元年(763)^⑤。两说虽然不尽相同,但都在上元元年卫伯玉就任神策军节度使之后。可知卫伯玉改任神策军节度使,与陇右神策军故地沦陷完全无关,《唐会要》和《新唐书·兵志》的记载不足为据。

据上文讨论可知,在乾元二年十二月至上元元年八月期间,卫伯玉率领的行营,与荔非元礼担任节度使的安西、北庭行营的番号完全相同。我们认为正是为了区别两个不同的行营,因此将卫伯玉行营改名为“神策军”,而卫伯玉本人也由安西、北庭行营节度使,转而成为了神策军节度使。《唐会要》称“语(诏)伯玉所领军号神策军,以伯玉为军使”,《新唐书·兵志》也称“即诏伯玉所部兵,号‘神策军’,以伯玉为节度使”,“所领军”(或“所部兵”)云云,也表明改变番号后的神策军,就是卫伯玉原来统领的兵马,即以“安西、北庭”为名的行营。卫伯玉行营本来就是由安西、北庭与陇右神策军勤王兵马两部分组成。最初大概因为西域兵马较众,所以径称“安西、北庭行营”,稍后又因为与荔非元礼所率行营名称相同,故而改作“神策军”。卫伯玉由安西、北庭行营节度使改任神策军节度使,是因为所率行营改换了番号,而不是改赴他任。

由于现存史料中没有留下卫伯玉行营名称改易的明确记录,因而在相关记载中出现了一些相互矛盾甚至错误的说法,从而造成了理解的困扰。比如上文《唐会要》和《新唐书·兵志》根本没有提到卫伯玉曾担任安西、北庭行营节度使,而《通鉴》先是在乾元二年十二月载,卫伯玉在疆子阪战后“为镇西、四镇(应为‘四镇、北庭’之误,见上文)行营节度使”,但一年之后,又在上元元年载,“及安禄山反,军使成如璆遣其将卫伯玉将千人赴难。既而军地沦入吐蕃,伯玉留屯于陕,累官至右羽林大将军。八月,庚午,以伯玉为神策军节度使”^⑥。将担任神策军节度使之前的历官直接与右羽林大将军相衔接,从而略去了安西、北庭行营节度使的历官。

其实卫伯玉由神策军兵马使迁右羽林大将军,转安西、北庭行营节度使,再转神策军节度使,这一过程在相关记载中是很明确的。如《册府》在疆子阪战役下载,卫伯玉“以功迁右羽林军大将军、知军事,转四镇、北庭行营节度使,献俘百余人至阙下,迁神策军节度”^⑦。《旧唐书》和《新唐书》本传虽然内容稍简,但也明确记载了神策军兵马使、右羽林军大将军、四镇北庭行营节度使、神策军节度使的历官顺序。我们认为,上文《唐会要》《新唐书·兵志》和《通鉴》阙载卫伯玉安西、北庭行营节度使历官,很可能是因为史书的编纂者不清楚这时存在两个安西、北庭行营的事实,无法解释

③ 《元和郡县图志》卷三九《陇右道》,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998页;《唐会要》卷七八《节度使》,1689页。参见《册府》卷九九二《外臣部·备御》,11655页。《元和郡县图志》称在临洮西八十里,《唐会要》及《册府》称“二百余里”。

④ 《新唐书》卷四〇《地理志》,1040页;《新唐书》卷二一六上《吐蕃传》上,6087页。

⑤ 《元和郡县图志》卷三九《陇右道》上,997页。

⑥ 《通鉴》卷二二一乾元二年十二月,7089页;同卷上元元年八月,7096页。

⑦ 《册府》卷三八五《将帅部·褒异》,4572页。

卫伯玉与荔非元礼同时担任安西、北庭行营节度使的现象,因而有意回避了卫伯玉在担任神策军节度使前任安西、北庭行营节度使的记载。

此外,《唐会要》称卫伯玉率神策军将士“赴难于相州城下。官军相州之败,伯玉收其兵,与观军容使鱼朝恩同保陕州”。相州战役早在乾元元年三月就已结束,而卫伯玉是在半年之后才率军入关。显然同样也是因为不了解这时有两个安西、北庭行营,因而张冠李戴,将李嗣业、荔非元礼所率行营参加相州会战之事,附会在了卫伯玉的名下。

六、杜甫“观兵诗”新解

上文通过对安西、北庭援军两次入关及与安史乱军作战的基本线索的梳理,考查了卫伯玉所率“安西、北庭行营”,与李嗣业、荔非元礼“安西、北庭行营”的关系,揭示了卫伯玉率军入关勤王的来龙去脉。在此基础上重新审视杜甫“观兵诗”,可以认定,“观兵诗”与参加相州战役的李嗣业“安西、北庭行营”无关。这两首诗的创作时间在乾元二年十月上旬杜甫流寓秦州(治今甘肃天水)期间,反映了卫伯玉“安西、北庭行营”勤王兵马入关勤王的史实。

首先,杜甫在乾元元年六月自左拾遗贬华州司功参军,二年七月,弃官携家流寓秦州,同年十月,离开秦州,南下同谷(今甘肃成县)^⑧。卫伯玉率领安西、北庭和陇右的军队抵达长安的时间是乾元二年十月中下旬,在勤政楼前举行了观兵仪式,并于十一月七日到陕州,与杜甫流寓秦州的时间(乾元二年七月至十月)前后衔接无缝。即杜甫在十月上旬赴同谷之前,在秦州见到了卫伯玉统领的西域勤王军队,并创作了“观兵诗”,这支军队在同月中下旬到达长安。《观安西兵》题称“过赴关中待命”,就是指这支部队途经秦州,开赴关中待命。

其次,《新唐书》称“诏百官上勤政楼观安西兵赴陕州”^⑨,而杜甫两首诗也都以“观兵”为主题,两者表述完全一致。我们认为肃宗特别下诏,命令百官集勤政楼前观兵,不仅是为了提振开赴前线的军队的士气,而且是要借此凝聚民心。与勤政楼观兵一样,杜甫在秦州观兵,应该也是由秦州当地特别组织的欢迎安西、北庭军队的仪式^⑩。也就是说,除了长安之外,在行营经过的沿途,也举行了类似的观兵活动。《观安西兵》所谓“孤云随杀气,飞鸟避辕门。竟日留欢乐,城池未觉喧”,应该就是对秦州观兵仪式的描写。

此外,“观兵诗”描述的内容,也与乾元二年九月史思明南渡黄河,攻克洛阳后

⑧ 参见《杜甫全集校注》“附录”一“杜甫年谱简编”,6536—6542页。

⑨ 参见上文第四节“洛阳再陷与第二批内调的西域军队”引。

⑩ 很可能是因为卫伯玉所率援军以西域军队为主,而且在此前收复两京及相州战役中,第一支入关的西域军队表现出的强大的战斗力,在当时人的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映像,所以“观兵诗”称“四镇富精锐”、“北庭送壮士”,而《通鉴》与《新唐书》则称“安西、北庭兵”或“安西兵”,都没有提到神策军。参见上文第四节“洛阳再陷与第二批内调的西域军队”。

的形势高度契合。《观北庭兵》“妖氛拥白马，元帅待雕戈”句，透露了此时战场形势的重要消息，对正确理解“观兵诗”非常重要。《杜甫全集校注》引《梁书·侯景传》称：“普通中，童谣曰：‘青丝白马寿阳来。’”^①后景果乘白马，兵皆青衣。”^②认为诗人以侯景所乘白马代指安史军队。我们认为此“白马”并非借称，而是洛阳白马寺的简称。史思明渡河后，李光弼在乾元二年九月庚寅主动放弃洛阳，撤军坚守河阳和陕州。史思明军队虽然得到了洛阳，但因为河阳守军的压制，实际上并未入宫，而是“顿兵白马寺，南不出百里，西不敢犯宫阙，于河阳南筑月城，掘壕以拒光弼”^③。直到上元元年四月，始正式率军入居洛阳^④。在半年多的时间里，白马寺实际上就是史思明的前线指挥部。“妖氛拥白马”，是指史思明率军攻占洛阳，陈兵白马寺之事。由此可以进一步确认，“观兵诗”就是创作于乾元二年九月史思明攻占洛阳之后，杜甫离开秦州之前。

“元帅待雕戈”句，《观北庭兵》解题认为“元帅谓李嗣业”。但李嗣业本人从来没有担任过元帅一职。在邺城会战时，朝廷因为郭子仪与李光弼资历、功业相当，难以相统属，因此特别不置元帅^⑤。诗中的“元帅”不可能指李嗣业其人，甚至相州战役也没有“元帅”。相州战役之后，德宗始在乾元二年三月三十日丙申，任命郭子仪为“东畿、山东、河东诸道元帅”^⑥，到同年七月，又以李光弼取代郭子仪为天下兵马元帅^⑦。“元帅待雕戈”之“元帅”，只能是新任唐军统帅李光弼。“雕戈”代指卫伯玉率领的安西、北庭行营将士，“元帅待雕戈”表明了诗人对西域貔虎之师的热切期待。至于“莫守邺城下，斩鲸辽海波”，则是希望唐军吸取相州兵败的教训，直捣安史军队在辽东的老巢。不能因为有“莫守邺城下”的描写，就机械地理解为是在唐军围攻邺城时所作。

安史之乱爆发后，唐西域守军内调勤王，是8世纪中叶唐朝乃至内亚历史上一个意义重大的关键性事件。就唐朝而言，西域援军在长达八年的内战中始终处在与安史军队斗争的第一线，在平定安史之乱的过程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保障了唐政权能够维持危而不坠的局面。对内亚历史来说，西域守军的内调，使唐朝势力骤然从巅峰跌入谷底，彻底丧失了此前在内亚政治力量角逐中的支配性主导地位，从而影响或改变了此后内亚历史的发展方向。西域唐军两次入关史实的廓清，对评价西域援军在平定安史之乱过程中的作用，认识8世纪中叶内亚历史的转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① 《梁书》卷五六《侯景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862页。

② 《旧唐书》卷一一〇《李光弼传》，3307页。

③ 《通鉴》卷二二一上元元年，7092页。

④ 《旧唐书》卷一八四《宦官传·鱼朝恩》，4763页。

⑤ 《旧唐书》卷一二〇《郭子仪传》，3453页。

⑥ 《旧唐书》卷一一〇《李光弼传》，3305—3306页。

New Perspective on Poems Titled *Guanbing* of Du Fu: Studies on the Loyalist Reinforcements from the Western Regions in the 2nd year of Qianyuan Era

Wu Yugui

The two Poems *Guanbing* (concerning military parade) of Du Fu drew a vivid picture of the relief troops from Anxi and Beiting of the Western Regions to suppress the An Lushan Rebellion. The two poems have been mistaken for a work of Du Fu when he served as an official in Huazhou in the first year of Qianyuan Era (758 A.D.). After analyzing the historical sources concerning the loyalist reinforcements from the Western Regions, the author suggests the two poems *Guanbing* were actually written in the 2nd year of Qianyuan era when Du Fu stayed in Qin Zhou, and the troops narrated in Du's poem was the second batch of reinforcements from Anxi, Beiting and the soldiers of Shence Army led by Wei Boyu. Though the second batch of reinforcements from the Western Regions accounted for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history of the Tang Dynasty and the Inner Asia, wrong recordation in traditional sources like *Jiu Tangshu*, *Xin Tangshu* and *Zizhi Tongjian* made the whole thing unacknowledged. Revealing the true story about the second batch of reinforcements from the Western Region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evaluating its role in suppressing the An Lushan Rebellion and understanding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changes of Inner Asia after the mid-8th century.